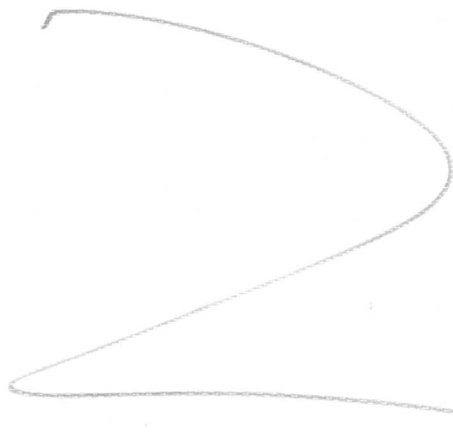


#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 文化译文集

主编  
马元曦  
康宏锦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女性文学文化学科建设丛书



## ARTICLES AND TRANSLATIONS ON GENDER AND LITERATURE AND CULTURE IN THE WEST

跨国的女性主义实践取决于跨过地点、身份、阶级、工作、信仰等方面的分歧，建立起女性主义的团结一致。在这样支离破碎的时代，建立这样的联盟是非常困难的，但却是非做不可的。全球资本主义摧毁了这样的可能性，但也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这是漂泊不定的知识分子取代根深蒂固的知识分子、后现代主义话语铲除“原生知识分子”的时代。在浩瀚无涯的地平线上做全方位的航行，有关移位的语义就会过多；我们总是“某人的他者”，总是想避开对同化的嘲弄。真正的选择——是社团还是种族，是种族的脆弱性还是新宗教教旨主义——那些因民族烦恼演变成悲剧的选择，在流亡者的想象中依然模糊不清。

C913.6/4

2008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 文化译文集

◎马元曦 康宏锦 主编

Articles and Translations on Gender and Literature and Culture in the West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文化译文集 / 马元曦, 康宏锦主编.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6  
(中国女性文学文化学科建设丛书)  
ISBN 978-7-5633-7516-5

I. 西… II. ①马…②康… III. ①女性主义—文化—  
西方国家—文集②妇女文学—文学研究—西方国家—文集  
IV. D441-53 I1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73806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  
(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桂林中核印刷厂印刷

(广西桂林市八里街 310 小区 邮政编码: 541213)

开本: 787 mm × 1 092 mm 1/16

印张: 15.5 字数: 245 千字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3 000 册 定价: 32.5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丛书总序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商业进程的更大推进，中国女性的主体意识在经济全球化和随之而来的中国社会意识形态解构与建构的过程中面临着新的困惑和生机。进入20世纪90年代，妇女文学的创作和批评始终呈繁荣景象，为女性主义活动在中国文学与文化领域打下了广泛持久展开的基础。有关妇女文学和文化的研究发展迅速，批评对象从文学扩展到大众传媒如电影、电视、网络、广告、时尚杂志，以及美术、设计和城市建筑等，已对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及文化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有关女性主义文学和文化的课程在中国高校较之其他纯社会性别理论的课程更受学生欢迎，而文学文化领域在过去20多年里一直处于发掘、开创最新思想和理论的前沿，加强这些领域的学科建设，从长远意义来说，对改变人们深层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模式、推动保护妇女权益的社会活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鉴于国内女性文学和文化学科教材缺乏的现状和有限的资源情况，“发展社会性别在文学文化学科中的建设”项目组在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下，经过三年的共同努力，编

撰了本套学科建设丛书，以供高校相关教学参考使用。

本套学科建设丛书由《中国女性文学读本》、《当代中国女性文学文化批评文选》、《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文化译文选》和《西方“后学”语境中的女权主义》构成，各书互相呼应，有一定系统性，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外女性主义对话和互补的特色，是项目组集体智慧的结晶。编撰工作在实际程序上包括项目前期论证、相关学科资源清理和理论梳理、项目进行中的商讨和切磋、专家审读初稿方案及定稿的修订完善工作。每位项目组成员都承担了该项目的具体而繁杂的工作。其中苏红军、屈雅君和荒林在前期论证中做了更多细致深入的工作，陈惠芬负责操持上海会议，屈雅君负责操持西安会议，马元曦负责海外翻译工作和解决版权问题，柏棣承担西方理论选文任务；是大家的付出和努力才使本丛书得以完成。项目组邀请的学术委员来自全国各高校，学术委员们真诚的学术品格和认真负责的学术作风、为项目的完整和丛书的完善所贡献的建议和提出的批评，共同凝结在丛书的构成之中。本项目在首都师范大学立项，荒林不仅负责项目的协调工作，而且为配合项目创办了学科建设园地——《中国女性主义》，为高校师生进行女性主义学术交流开辟了平台。

丛书期待读者批评指正，期待在教学参考使用中得到修改意见，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作出修订。根据教学的需要，本项目也许还将推出新的选本和导读本。

感谢福特基金会的支持！

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支持！

向所有为本项目和丛书付出劳动的朋友们致敬！

“发展社会性别在文学文化学科中的建设”项目组

2006年12月

# 前言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文化译文集》(以下简称“译文集”)是继我们主编的《社会性别与发展译文集》、《社会性别·族裔·社区发展译选》之后的第三本文集。我们的目的一如既往,是翻译、介绍西方近期(多为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版)的一些有关文章,供大家就妇女学研究所涉及的题目参考、讨论。和前两本书的主题一样,本书所选的文章仅仅是论及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文化的无数作品中极少的一部分,但这些文章提出了该领域与现时有关的人们关注、讨论的不少问题,尤其是有关文化研究的题目,如多元文化、本土文化、跨国文化、消费文化、物质文化、文学文化与政治经济、社会性别、身份变化及认同的关系等,以及如何从各种女性主义的观点和角度来探讨、争辩这些问题。尽管本书所选的文章不全是直接讨论文学的,更多的涉及文化,但我们认为文学和文化很难截然分开,它们之间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

本书中涉及中国问题的是台湾大学副教授蓝佩嘉女士的《销售女体,女体劳动——百货专柜化妆品女售货员的身体劳动》。蓝教授以在台湾百货公司工作的化妆品女售货员为例,探讨在劳动、生产及消费之间的关系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文化译文集

中如何形成社会性别化的身体和主体。她提出以“身体劳动”的概念来分析销售化妆品这一劳动过程多元的劳动内容与多重的权力关系:女售货员的身体和身份如何被建构,成为劳动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她们又是怎样不断完成、调整她们的社会性别及阶级身份认同,如何抵抗对她们身体劳动的要求。文章为某些服务行业从业人员的身体文化领域提供了有价值的研究课题。

有两篇文章着重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讨论消费文化、物质文化及其相关问题。一篇是丽欧拉·奥思兰德尔的《19世纪法国消费者活动的社会性别表现》,另一篇是乔安·霍洛斯的《消费与物质文化》。这两篇文章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分别审视法国、英国的消费和物质文化的历史演变及此过程中社会性别的各种表现,论及生产、劳动和消费的关系,生产、消费与国家政治经济的关系及其在不同历史时期对男性、女性身份特征的影响、调整、改变、认同、创新。

其他几篇文章,如凯西·佩斯的《化妆,翻新:化妆品、消费文化、妇女的身份特征》、乔安·霍洛斯的《时装与美容实践》和萨拉·妮勃洛克的《广告业》,进一步阐述了消费文化、商品文化如何通过化妆品、时装、美容实践等手段影响、改变妇女的身份特征。这里,消费文化、商品文化一方面仍然把女人表现成某种商品或对其加以物化,而另一方面,却也给妇女提供了提高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的机会。涂脂抹粉、穿时装、美容美体等可视为表述她们要求、愿望的一种复杂语言,一个创造“独立自我”的领域,挑战现存的性别、种族、阶级之间的社会差别,以求得对此进行重新界定的策略。此外,由于当前铺天盖地的广告里绝大多数老套、固定的妇女形象模式(尽管体现方式多种多样)的影响,要摆脱社会的父/夫权桎梏仍将是一场持久、艰巨、矛盾交错的斗争。

卡罗琳·索利希欧的文章《两种女性主义的故事:当代女性主义争议中的权力与牺牲品》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女性主义理论建设和运动实践的长期性、复杂性及艰难性。作者阐述了20世纪60年代至今思想理论界对女性主义的各种看法、争议和评论。她认为“女性主义是一种追求,一种我们不断界定的追求,而不是一种用来限制我们的教条”,她提出,女性主义学者、思想家应懂得女性主义理论和女性主义历史之间的紧密联系,协助对权力运作情况进行解释,并从种族与阶级差别角度陈述问题,从斗争历史中找到抵抗的策略。

社会性别和表现、自我表现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女性主义探讨的一个问

题。周蕾教授在她的文章《社会性别与表现》中深入地讨论了这个问题。她就表现的两种定义——美学意义及立法和政治意义展开论述,其二元结构——“一方被设定为另一方的拷贝、复制品:一个被具体化了的‘替代物’”,或以一小部分人来代表一个大群体(后者并不一定总是得到前者的授权)。她还讨论了社会性别中的二元结构,进而分析如何看待自我表现的问题。作者在文章最后提出一些令人深思、有待研究、讨论的课题——“对社会性别来说,表现的两个前途暗示了以下几个问题:作为一个话语,社会性别是否能分享逐步消失的传统美学表现带来的技术和社会效益而不用放弃它的一些基本‘现实’,如‘男人’和‘女人’?反之,社会性别能否继续表现被剥夺了权利的人们,其中包括世界上多数男人和女人,而不需要向自己的超级叙事地位以及世界范围的技术‘进步’让步?……面对日益扩大的表现的两个极端之间的认识论差距……要求不仅对社会性别问题作出反应,而且要对种族、阶级和无数种类的差别作出反应——要做的事情很多。在这个差距分歧中,社会性别也必须找到自己未来的道路”。

与表现这一课题有一定联系的为 E. 安·卡普兰的《麦当娜政治:变态、压制还是颠覆?或假面具与/作为天工巧匠》。在美国,麦当娜已成为一种现象、一种政治;在文化研究中,对麦当娜现象、麦当娜政治有大量的评论和争议。电影、电视等媒体所表现的麦当娜,她的言谈举止和形象,是否“真正的”麦当娜?她声称:“你们将永远不会了解真实的我,永远不会。”真是这样的情况吗?是否存在一个永恒不变的自我或隐藏着的自我,一个永恒不变的身份?作者还提出,对西方文化如何建构“个人”以及建构内在和外在自我的分裂方面的投资,我们了解多少,又如何分析?作者在指出麦当娜的言行是与特定的文化背景、时代相联系的同时,结合人们对麦当娜政治所采取的各种矛盾的立场、观点,深入解剖她归纳的对麦当娜现象的三种主要态度,提出将麦当娜作为商品加以分析的观点。

吉塔·卡普在《全球一体化和文化:在虚无缥缈间航行》一文开篇即提出自己的看法:“全球主义这个专有名词是指一种厚颜无耻的市场意识形态……所谓全球化也就是在全球范围推行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及其固有的世界观。”文中提到许多诸如全球化与本土化、全球文化与本土文化、民族与国家、本地群体与国家、殖民与后殖民主义、国际主义、东方主义等概念。作者以印度为例讨论这些概念、话语和实践。作者还通过学者、作家、剧作家、诗人及其作品(其中不少以女性为主人公)来分析他们(也许还包括作者本人)在当代各种二元结构中矛盾交错,时而清晰、时而含混的航行中的

感受、看法和思考、评议。

这里要说的最后一篇文章(不是本书的最后一篇)是《再访〈在西方的眼光下〉:通过反资本主义斗争赢得女性主义的团结一致》。作者是女性主义研究和实践领域里众所周知的桑德拉·塔儿佩德·默罕梯。我们觉得这是一篇分量较重的文章,它提出了许多关于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问题。此文是作者对1986年写的《在西方的眼光下》的重审、反思、澄清和扩展,文本内容丰富、思路清晰。我们想以作者在文章末尾说的一段话结束前言:“跨国的女性主义实践取决于跨过地点、身份、阶级、工作、信仰等方面的分歧,建立起女性主义的团结一致。在这样支离破碎的时代,建立这样的联盟确是非常困难的,但却是非做不可的。全球资本主义摧毁了这样的可能性,但也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马元曦 康宏锦  
2006年12月23日

# 目 录

前言 >>1

■ 桑德拉·塔儿佩德·默罕梯

再访《在西方的眼光下》:通过反资本主义斗争赢得女性主义的团结一致  
>>1

■ 周蕾

社会性别与表现 >>29

■ 卡罗琳·索利希欧

两种女性主义的故事:当代女性主义争议中的权力与牺牲品 >>45

■ 吉塔·卡普

全球一体化和文化:在虚无缥缈间航行 >>60

■ 苏珊·斯坦福·弗里德曼

超越女作家批评和女性文学批评 >>82

■ 丽欧拉·奥思兰德尔

19世纪法国消费者活动的社会性别表现 >>106

■ 乔安·霍洛斯

消费与物质文化 >>137

■ 蓝佩嘉

销售女体,女体劳动——百货专柜化妆品女售货员的身体劳动 >>153

■ 凯西·佩斯

化妆,翻新:化妆品、消费文化、妇女的身份特征 >>178

■ 乔安·霍洛斯

时装与美容实践 >>199

■ 萨拉·妮勃洛克

广告业 >>217

■ E.安·卡普兰

麦当娜政治:变态、压制还是颠覆?或假面具与/作为天工巧匠 >>226

致谢 >>240

◎ 桑德拉·塔儿佩德·默罕梯(著)

康宏锦(译) 马元曦(校)

再访《在西方的眼光下》：  
通过反资本主义的斗争赢得女性主义的团结一致

我这篇文章是在一些朋友的敦促下，怀着战战兢兢的心情写的，是为了重新审视16年前写的那篇文章里的主题和论点。这是一篇很难写的文章，我同意写这篇文章时很犹豫，而且怀着谦卑的心情，但是我觉得必须这样做，对自己的观点要负全责，或许也可以解释一下这些观点在女性主义理论辩论中有些什么影响。

《在西方的眼光下》(*Under the Western Eyes*, 1986)不仅仅是我第一篇“女性学”著作，还标志着我成为国际女性主义群体的一员。<sup>①</sup> 首先，我写那篇文章时刚刚获得博士学位，我现在是女性学教授，因此，就我在美国学术界的处境而言，不再是处于西方的眼光“下”，而是在西方的眼光“内”了。<sup>②</sup> 其次，我写那篇文章时，一场振奋人心的跨国妇女运动正在兴起，而我现在写这篇文章的环境却截然不同了。随着公共生活的私有化和公司化程度日益加大，在美国要想发起这样一场妇女运动是越来越困难了(尽管世界范围内妇女

---

① “Under Western eyes” has enjoyed a remarkable life, being reprinted almost every year since 1986 when it first appeared in the left journal *Boundary 2* (1986). The essay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German, Dutch, Chinese, Russian, Italian, Swedish, French, and Spanish. It has appeared in feminist, postcolonial, Third World, and cultural studies, anthropology, ethnic studies, politic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sociology curricula. It has been widely cited, sometimes seriously engaged with, sometimes misread, and sometimes used as an enabling framework for cross-cultural feminist projects.

② Thanks to Zillah Eisenstein for this distinction.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文化译文集

运动蓬勃发展),而我所能接触和斗争的环境,却日益限于美国学术界了。美国的妇女运动变得越来越保守,而更为激进的反种族主义的女性主义活动却发生在妇女运动之外。因此,我在这里所说的,就受到我所生活的环境的影响。现在是重审《在西方的眼光下》的时候了,以澄清 1986 年那些含蓄的和没有发表的观点,并且对那时勾画的理论框架作进一步扩展,赋予其历史意义。我还要对人们是怎样阅读或误解那篇文章作出评议,并对批评和赞扬作出回应。是时候了,我应该明确地从批评转向重建,提出 21 世纪初女性主义者面临的迫切问题,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几十年后,《在西方的眼光下》——在西方内外的第三世界——受到了怎样的探索和分析?在这一历史时刻,什么是比较女性主义政治所面临的迫切的理论问题和方法论问题呢?

基于《在西方的眼光下》一文已有的及继续存在的生命力,以及我本人游弋于跨国女性主义学术活动与网络的体会,我首先总结一下《在西方的眼光下》一文的中心论点,并把这些观点置于学术的、政治的和制度的环境中来讨论。在这一讨论中,我将对人们在一些不同的,往往是重叠的学术话语中阅读那篇文章的方法加以描述。我将提出一些积极的反响,以便澄清西方、第三世界等词语的不同含义,重新提出女性主义理论中普遍和个别之间关系的问题,并就我早先文章里含糊不清或模棱两可的地方明确提出我的观点。

首先看看在过去 16 年中,我的想法改变了多少。在 21 世纪初,跨国女性主义活动面临着哪些挑战?女性主义跨文化活动的可能性有多少发展和变化?在我写这篇文章时,哪些学术的、政治的和制度的环境使我改变,从而形成新的承诺?1986 年以来,哪些学术和政治认同的范畴发生了改变,又有哪些范畴没有改变呢?我想就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撰写《在西方的眼光下》时的预期、效果和政治选择与我今天的预期、效果和政治选择进行一次对话。我希望这会促使其他人也就我们女性学界的个人和集体项目提出类似的问题。

## 重访《在西方的眼光下》——使女性主义学术摆脱殖民化:1986

“西方女性主义”通过对第三世界妇女的生活与斗争的迂回的殖民化来研究第三世界妇女,我写作《在西方的眼光下》就是要揭示和明确地批评这种做法。我还要揭示:为西方女性主义狭隘的自我利益服务的女性主义跨文化学术,通过以欧洲为中心的、虚假的普遍化的方法论形成了权力和知识之间的关系。我认为,在注意到有必要对“我们的分析策略和原则的政治含义”进行审

视的同时,强调女性主义学术和女性主义政治组织之间的联系是至关重要的。我还要在“第一世界”垄断的全球政治和经济框架内为女性主义学术找到合适的场所。<sup>①</sup>

我最直接的目的是指出跨文化女性主义活动必须注意环境、主体性与斗争的微观政治以及全球经济、政治制度和过程的宏观政治。我对玛丽亚·麦尔斯(Maria Mies, 1982)对纳萨普尔的花边工人的研究进行讨论,是要说明怎样进行多层次的全面分析,以便揭示个别往往具有普遍意义,而不要用普遍来抹杀个别,或在这两个词之间筑起不可跨越的鸿沟。这一分析包含着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基本框架,以及物质现实在地方和微观上,以及全球的整体层面上的定义。当时我为这个定义争辩,并为不要仅仅通过压迫,还要通过历史的复杂性以及改变这些压迫的许多斗争来认识第三世界而争辩。这样,我的辩论就既强调有根据的个别的分析,又跟更大的乃至全球的经济和政治的框架联系在一起。我受到跨国界的女性主义团结前景的鼓舞,虽然对很多读者来说,是看不到这一前景的。希尔维亚·沃尔比(Sylvia Walby, 2000)在我所谓的地点政治这一论点作出有洞察力的分析时认同我的观点,并对我所说的差异与平等之间的关系作了更精练的概括。她进一步提出,有必要在西方、后殖民的、第三世界女性主义者之间形成共有的参照结构,以便决定什么才算是差异。她颇有见地地指出:

默罕梯和其他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者往往被理解为仅仅是在为普及她们的工作时某种处境的知识辩解。实际上,默罕梯通过一个复杂且微妙的论点表明她是对的,而西方白人的女性主义不仅仅是不同的,更是错的。在这个过程中,她先提出一个共同的问题,又提出一组共同的概念,

---

① Here is how I defined “Western feminist” then: “Clearly Western feminist discourse and political practice is neither singular or homogeneous in its goals, interests, or analyses. However, it is possible to trace a coherence of effects resulting from the implicit assumption of ‘the West’ (in all its complexities and contradictions) as the primary referent in theory and praxis. My reference to ‘Western feminism’ is by no means intended to imply that it is a monolith. Rather, I am attempting to draw attention to the similar effects of various textual strategies used by writers which codify Others as non-Western and hence themselves as (implicitly) Western.” (Mohanty 1986, 334) I suggested then that while terms such as First and Third World were problematic in suggesting oversimplified similarities as well as flattening internal differences, I continued to use them because this was the terminology available to us then, I used the terms with full knowledge of their limitations, suggesting a critical and heuristic rather than non-questioning use of the terms. I come back to these terms later in this essay.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文化译文集

最终提出跟白人女性主义形成一个共同的政治项目的可能性。她希望能说服白人女性主义同意她的观点。她不满足于把西方白人女性主义当作某种处境的知识而安然保留其地方的和局部的视角。没有一点这个意思。她所要表达的是一个更为普遍的真理。她希望运用辩论的力量来达到目的。(Walby, 2000, 199)

沃尔比阅读这篇文章的方法促使其他人接受我有关共同的女性主义政治项目的观点,这一观点批评了西方女性主义学术对第三世界妇女的影响,但它是在团结一致和共享价值观的框架内提出的。我坚持认为,差异的特征是以注意到不同的妇女群体内部与这些群体之间的权力差异的平等的前景为基础的。我并不反对一切形式的概括,我不是偏向局部、反对整体,不是偏向差异、反对共性,也不是偏向推理、反对物质。

我写《在西方的眼光下》一文,不是要证明平等主义和非殖民化的跨文化学术是不可能存在的,也不是要把“西方”和“第三世界”的女性主义定义为截然相反的,以此得出根本不可能形成西方女性主义和第三世界女性主义之间的团结的结论。<sup>①</sup>但是,这篇文章在很多情况下以这样的意义被阅读和引用。<sup>②</sup>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尖锐的对立。也许指出我当时写作的学术和制度环境以及从那时起对解读这篇文章有影响的变化,可以澄清写这篇文章的动机以及文章的论点。

在学术环境方面,我写那篇文章时,跟批评以欧洲为中心的人文主义的批

---

① My use of the categories Western and Third World feminist shows that these are not embodied, geographically or spatially defined categories. Rather, they refer to political and analytic sites and methodologies used—just as a woman from the geographical Third World can be a Western feminist in orientation, a European feminist can use a Third World feminist analytic perspective.

② Rita Felski's analysis of the essay (1997) illustrates this. While she initially reads the essay as skeptical of any large-scale theory (against generalization), she then goes on to say that, in another context, my "emphasis on particularity is modified by a recognition of the value of systemic analyses of global disparities" (10). I think Felski's reading actually identifies a vagueness in my essay. It is this point that I hope to illuminate now. A similar reading claims, "The very structure against which Mohanty argues in 'Under Western Eyes'—a homogenized Third World and an equivalent First World—somehow remanifests itself in Cartographies of Struggle" (Mohanram 1999, 91). Here I believe Radhika Mohanram conflates the call for specificity and particularity as working against the mapping of systemic global inequalities. Her other critique of this essay is more persuasive, and I'll take it up later.

评家们是一致的,他们注意到这种人文主义虚假的概括以及以男性为中心的特点。我的项目建立在坚信个别对普遍的重要性——坚信局部有助于阐明普遍——的基础上的。我所关心的是要注意这种一般化的框架存在的两重性,有色妇女对“白人女性主义”的批评以及第三世界女性主义者在摆脱殖民化的模式内对“西方女性主义”的批评。不论是政治还是个人方面,我立志要建立一个非殖民化的跨边界的女性主义大团结。我看到在颇有影响的女性主义学术界以及主流的妇女运动中,出现了坚持殖民化、以自我利益为重的倾向,我立志开展一个比她们更大的女性主义项目。

我新近在一个以白人为主的美国学术机构找到的教书职务也很影响我此刻的写作。我决心在这个空间里进行干预,以便为第三世界、移民以及其他跟我一样的边缘化的学者创造一个场所,这些人认为在欧美人居多的女性主义学术界以及她们的社区之内,自己或是被抹杀,或是被歪曲。我开始能够为第三世界/移民妇女学者开辟一块学术天地,正如我在协助组织的跨国界会议“共同的差异:第三世界妇女和女性主义视角”(Urbana, Illinois, 1983)时所开辟的一片天地,对此我感到极大的满足。这次会议有可能建立一个摆脱殖民化的、跨边界的女性主义群体,使我坚信“共同的差异”能够形成深厚团结的基础,我们必须与在女性主义者之间存在的平等权利关系进行斗争,以达到此目的。

在我写这篇文章时,有很多事情对我有影响,个人的和专业上的。如有人先把我比作白人女性主义者“未尽本分的女儿”,后把我看作第三世界/移民妇女学者的良师益友;从邀请我到不同的学术场合向女性主义观众讲话到告诫我应该集中精力研究早期儿童教育,而不要涉足“女性主义理论”。主动显示不忠,既要付出代价,也会有所收获。无论如何,我要说,写出《在西方的眼光下》一文,我不后悔,而是感到极大的满足。

我认为,对这篇文章的阅读和误解,是由于30年来后现代主义在美国学术界的盛行。我从未自诩为“后现代主义者”,为什么我的观点被囊括在这个标签下呢,对此进行反思很重要。<sup>①</sup> 实际上,之所以选择此刻来重访《在西方的眼光下》,原因之一是我想要指出后现代主义的影响。<sup>②</sup> 当我被理解为反对一

---

① See e.g., the reprinting and discussion of my work in Nicholson and Scidman, 1995; Warhol and Herndal, 1997; and Phillips, 1998.

② I have written with Jacqui Alexander about some of the effects of hegemonic post-modernism on feminist studies; see the introduction to Alexander and Mohanty, 1997.

切形式的概括,力主差异反对共性时,我被误解了。误解是在居统治地位的后现代主义话语的环境里发生的,后现代主义话语标榜为“涵盖”所有整体的联系,只强调认知和社会结构的可变性与建构能力。

的确,我引用福柯的观点来勾画权力/知识的分析,但我也引用了阿诺·阿波代尔·马勒克(Anour Abdel Malek)的观点来说明一个特定的帝国权力结构的方向性和物质的影响。我也引用了玛丽亚·麦尔斯的观点,以表明有必要作物质的分析,这种分析把日常生活与当地具有社会性别特征的环境以及意识形态跟资本主义更大的、跨国的政治和经济结构以及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我感兴趣的是看到为什么“差异”超越“共性”以及差异是怎样超越共性的,我认识到我的文章对这种可能性敞开了大门。1986年,我的写作主要是对以欧洲为中心的话语的虚假的普遍性提出挑战,也许对后现代主义话语力主差异反对共性的做法批评得不够。<sup>①</sup>现在我要重新强调局部和普遍之间的联系。1986年,我强调的是差异,但是现在我要重新捕捉并重申其更丰富的含义——差异更丰富的含义,始终存在于跟普遍的联系上。换句话说,这次讨论使我能够再一次强调仅仅是“差异”本身,是无法形成差异的。懂得了差异和特殊性,我们才能更清楚地看到两者之间的联系与共性,因为任何边界都是不完全的,不是僵硬得不可改变的。懂得差异,才能更好地理解两者之间的联系,才能更准确地懂得跨边界的含义,才能看到差异使我们能够更全面地将普遍的事物理论化,真正的挑战就在此。正是学术上这样的进展使我能够关心不同社区和身份的妇女,立志建立联合行动,形成跨国界的大团结。

就我而言,究竟哪些改变了,哪些没有改变呢?在历史的这一瞬间,对女性主义学术界和组织活动来说,存在哪些紧迫的学术与政治问题呢?首先,我要说,当今世界通过商品化和消费使多种文化与“差异”得以生存,因而西方、第三世界这些词语仍然具有政治及说明的价值。然而,我现在想用的词语就不限于这些了。随着美国、欧盟、日本成为21世纪初资本主义强权的症结,这些国家边界内的第三和第四世界日益增多,世界范围的第一国家/本地人争取

---

<sup>①</sup> To further clarify my position—I am not against all postmodernist insights or analytic strategies. I have found many postmodernist texts useful in my work. I tend to use whatever methodologies, theories, and insights I find illuminating in relation to the questions I want to examine—Marxist, postmodernist, postpositivist realist, and so on. What I want to do here, however, is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making explicit some of the political choices I made at that time—and to identify the discursive hegemony of postmodernist thinking in the U. S. academy, which I believe forms the primary institutional context in which “Under Western Eyes” is read.